

余育婷◎著

像的系譜

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

想

蘆葦綠乳西土貢 離支丹實南州來

此瓜瀆間出呂宋 地不愛寶呈奇材

萬曆年中通舶使 桶底緘藤什襲至

嚴隴初開竹城珍 蔓延反作中邦利

登萊朱卯盈郊園 田夫只解薯稱番

豈知糧糧資甲貨 攸山可廢躡鷓躑

聖朝務本重耕籍 地生之物補懷瘠

不須更考王禎書 對此豐年慶三白

本書榮獲
國家科學委員會
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
補助出版

目次

自序	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疇與材料.....	10
第三節 研究回顧.....	15
第四節 研究方法.....	25
第二章 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的移植與傳播.....	35
第一節 儒學／書院教育的推動.....	36
第二節 方志藝文志的修纂.....	53
第三節 宦遊詩歌對清代臺灣文人的影響.....	66
小結：詩歌典律的形塑.....	85
第三章 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體用論.....	89
第一節 詩的本質.....	89
第二節 詩的功用.....	111
第三節 詩的象徵資本.....	125
小結：一個「模糊認識」的詩歌起始階段.....	134
第四章 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創作論.....	141
第一節 詩歌學問化的創作傾向.....	141
第二節 格調／性靈的相互影響.....	151
第三節 清代臺灣文人眼中的詩學典範.....	164
小結：缺乏具體詩法主張的創作態度.....	188
第五章 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審美論.....	191
第一節 「雅正美學」的評賞態度：詩歌典律對清代臺灣文人	

2 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

的影響.....	192
第二節 「清真趣」的詩歌美學觀：兼論園林文學的出現及其 意義.....	221
第三節 「以詩爲史」的書寫角度：寫實風格的產生.....	245
第四節 從「不分唐宋」到「詩學晚唐」：清代臺灣文人對唐宋 詩的審美態度.....	272
小結：詩歌美學觀的形成過程與象徵意義.....	293
第六章 結論.....	299
參考書目.....	31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康熙 22 年 (1683)，清帝國平定鄭氏在臺勢力，臺灣正式進入清領時期。此時的臺灣，是移民者的天堂，「文學」之於那群千辛萬苦來臺的移民而言，本是遙不可及的事。然而，當時間往後推移到乙未割臺的 1895 年，臺灣文風之盛，已不可同日而語。在清領臺灣的 212 年間，臺灣從文風不盛的移墾社會，轉變為一詩人輩出的海上島嶼，這其間「文學」的成長茁壯明顯可見，而這當中，詩歌更是此一時期最重要的文學資產。正因如此，「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面貌為何？」便成為一個受人矚目的問題。

面對這個問題，學界曾從幾個面向來回答：其一，挑選重要作家作品，深入剖析其人其詩在臺灣文學史上的地位與貢獻，藉以管窺整體的臺灣古典詩歌發展概況。其二，依照時間順序，從康、雍、乾、嘉、道、咸、同、光等時期中，挑選某個階段為研究範疇，討論此期的文學概況，試圖呈顯某一時期的臺灣古典文學特色。其三、依據不同區域，進行區域文學研究，探討地方區域的歷時性發展，並挑選代表作家作品，以此析論區域文學的特徵何在。其四、針對臺灣古典詩歌中某一常見的主題，如風土、八景、民變、地理……等詩歌書寫，加以溯源並說明何以產生這類主題內容。¹上述不同的研究路徑，有時會對照出宦遊文人與

¹ 關於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詳見第三節研究回顧。

2 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

本土文人在詩歌書寫上的異同，以及對「臺灣」的認知程度，而結論亦使吾人得以一窺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面貌樣態。

如今，站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若要再重新審視這個問題，勢必要跳脫原有的論述框架，才能挖掘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另一層面貌。在筆者個人的摸索中，發現試著從「知識論」(epistemology)的角度出發，以清代臺灣文人的視域為核心，藉由探討臺灣文人如何認識詩歌？看待詩歌？進一步去理解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生成與發展，或可成為一個全新的思考向度。因為，清代臺灣本為一個移墾社會，從移墾社會過渡到文治社會，這當中最重要象徵指標是臺灣文人能詩者大增，正因臺灣文人的文學素養在清領時期中明顯提升，才有日治時期詩社林立的文學與社會現象出現。因此，探討臺灣文人的詩歌知識是如何養成，臺灣文人的學詩歷程、評賞觀點又是如何生成，便成為本書主要關注的基礎核心。

基於開展新的研究路徑、跳脫既有的論述框架這一思考點，筆者將致力於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系譜的考掘，以求能有不同的研究視野去觀察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面貌。循此，以下將分別說明「詩歌知識論」與「想像的系譜」的構思方向，並論述「為何」以及「如何」表述古典詩歌在清代臺灣的生成歷程。

一、詩歌知識論

知識論，原是西方哲學理論的重要一環，主要探討人如何去認識，以及認識的能力，認識的對象等。簡單來說，知識論「就是問我們怎麼認識到所要認識的東西。」²如將著重探討知識的

² 蔡錚雲，《另類哲學：現代社會的後現代文化》(臺北：邊城，2006)，頁123。

本質、來源等問題的知識論，應用到詩歌研究上，則如何獲得詩歌知識、詩歌的本質是什麼、以及詩歌知識生成的種種面向，都將成爲探討的對象。從清代臺灣文人所留下的詩作內容來看，可知清代臺灣文人對於作詩一事，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要求。但，以目前所見文獻資料來看，清代臺灣尚未出現任何關於詩學理論的具體論述，例如說詩話專著。不過，儘管清代臺灣文人沒有留下任何詩學理論的著述，這並不表示臺灣文人對於詩歌沒有任何認識。因此，從知識論的觀點出發，探討清代臺灣文人的學詩歷程，瞭解臺灣文人如何認識詩、如何作詩、又如何評詩，應有助於理解清代臺灣文人詩歌知識的生成過程。

由於知識論的核心是知識的本質、來源等問題，是以知識生產也成爲重要的議題。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以知識生產爲主題的歷史書寫，曾揭示知識與權力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傅柯的「考掘學」(archaeology)、「系譜學」(genealogy) 等論述裡，可以看到「權力是一切意義生成的基點之一。」³無獨有偶地，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也從場域 (field)、慣習 (habitus)、資本 (capital)、位置 (position) 等概念，說明場域是一種權力關係，「文學創作乃是爭取文學場域中的『位置』(position)，而創立風格與特色是場域內『佔位』(position-taking) 的策略與爭奪象徵資本的手段。」⁴當場域建構、形塑出慣習的

³ 關於傅柯的「考掘學」(archaeology)、「系譜學」(genealogy) 概念，參閱王德威，〈「考掘學」與「宗譜學」——再論傅柯的歷史文化觀〉，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臺北：麥田出版社，1994)，頁 39-66。

⁴ 王瓊玲，〈重寫文學史——「經典性」重構與明清文學之新詮釋〉，收入王瓊玲、胡曉真主編，《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 1-18。關於布赫迪厄的場域 (field)、慣習 (habitus) 等概念，參閱 Patrice Bonnewitz 著、孫智綺譯，《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Pierre

同時，慣習也影響到每一個知識生產者的認知系統與品味愛好。由此來看，布赫迪厄對知識本質與知識生產的闡述，同樣強調了權力與知識之間的相互辯證。⁵傅柯與布赫迪厄對於知識與權力的論述，在方法論上給予筆者很大的啟發。不過，儘管傅柯和布赫迪厄都觀察到權力的複雜與重要，但知識和權力並不完全是一種循環論證的機械模式，關於這一點，布赫迪厄已有清楚說明。⁶因此，筆者在試圖建構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時，除留意權力與詩歌知識的勾連外，也將關注臺灣文人的詩歌知識論有何創新之處，以及這個文學創新所象徵的意義為何。

在中國，當詩歌來到「清代」這個時間點，已是一個很成熟的文類，不論是詩歌創作或詩歌理論，都有很傑出的成績。然而，在同一個時間點，對照臺灣的詩歌發展，明顯可以看出臺灣的詩歌仍處在一個學習與模仿的原始階段。由於清代臺灣文人是在清帝國所推動的文教建設下的場域中養成，是以要探討臺灣文人如何看待「詩歌」這一文類，首先，將追究臺灣詩歌知識是如何由中國移植到臺灣？當詩歌知識版圖形成後，又是如何在臺灣傳播

Bourdieu、Loic Wacquant 著、李猛、李康譯，《布赫迪厄社會學面面觀》（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

⁵ 以「知識」為主題的研究，傅柯（Michel Foucault）和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論述僅是其中之一，其餘如薩依德（Edward W. Said）、孔恩（Thomas S. Kuhn）……等，亦有傑出貢獻。關於社會學與知識歷史的發展演變，參閱 Peter Burke 著、賈士蘅譯，《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頁 26-50。

⁶ 在針對「創新和能動作用的因素從何而來」的問題時，布赫迪厄曾進一步說明：「慣習不是宿命。由於慣習是歷史的產物，所以它是一個開放性的性情傾向系統，不斷地隨經驗而變，從而在這些經驗的影響下不斷地強化，或是調整自己的結構。」換言之，「透過意識的覺醒，或者某種形式的『自我努力』，個人可以對他的性情傾向施加影響。」參閱 Pierre Bourdieu、Loic Wacquant 著、李猛、李康譯，《布赫迪厄社會學面面觀》，頁 205-210。

流通？最終是否構成某種詩歌典律與美學典範供臺灣文人學習？這些問題，雖僅是詩歌生成背景的探討，但實際上卻牽涉到文化美學的傳承，與知識權力的展演，是以必須細繹這詩歌知識網絡的流動脈絡，以及詩歌內容、題材、風格的表現方式，方能呈現「從中國到臺灣」這一單線的移植與傳播過程，究竟造成何種影響，以及這個影響開展出怎樣的詩歌生成面向。因為唯有當臺灣文人的知識養成後，屬於臺灣的詩歌知識論才有討論的空間。

不可否認的是，清代的詩學批評理論必然與臺灣文人的詩歌知識有所勾連，但在清代中國曾蔚為風潮的神韻說、格調說、肌理說、性靈說，乃至唐宋詩之爭，是否均對臺灣文人的詩歌認識產生影響？當這麼多詩學批評理論從中國傳入臺灣之際，是否還有「時間差」需要考量？如康熙時期大盛的神韻說，與被乾隆皇帝推崇的格調說，難道都可以在理論出現的同時，立即地傳入臺灣並影響臺人的書寫創作與審美觀感？關於這些詩歌知識的來源與本質問題，從清代臺灣文人的論詩詩來看，其對詩歌本質、功用的認識，說明了清代中國的詩學理論固然蓬勃發展，也對臺灣文人有一定的影響，但真正影響臺灣文人更深者，追根究柢仍是儒道思想以及清代重學的時代風氣。詩歌本有教化、抒情、酬酢等作用，這些作用基本上又與詩歌本質相互牽連，如將「詩歌」視為一種話語（discourse）置於「清代臺灣」這個特定的時間與地點上，那麼「詩歌」的本質與功用，實決定詩歌知識體系的形成基礎，以及詩歌網絡的運作方式。

而當詩歌知識的來源與基礎得到初步的釐清後，接踵而來要探討的便是臺灣文人的創作態度與審美傾向。在臺灣文人接受詩歌知識，並認識詩歌的本質、功用後，其詩歌創作不免也受到時代風氣與前輩詩人的影響，究竟臺灣文人眼中的詩學典範為何？

審美標準又在哪裡？都值得進一步探究。在這當中，筆者也觀察到臺灣文人的創作與審美，固然有依循典範詩人或詩歌典律之處，但在臺灣文人的詩歌涵養逐漸普及的道咸時期，也出現了新的詩歌主題與美學實踐，如新竹鄭用錫、林占梅所帶起的園林文學，即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園林文學的出現，在臺灣詩史上意義非凡，對照過往的八景或空間書寫而言，「園林」是一個嶄新的題材，⁷而潛園與北郭園所帶出來的文學活動與文學社群，意味著從宦遊文人手上拿回文學的主導權，代表著過去以宦遊文人為核心的主導時代已有轉變。這樣的創新與改變，如置於臺灣文學史上，是否可視為臺灣文人自我意識覺醒的一種象徵？如果可以，那麼這個詩歌發展脈絡又該如何梳理，才能透顯園林文學在臺灣文學史上的意義？事實上，從這些問題的生發，均已證明清代臺灣古典詩歌內容的豐富性，以及詩歌生成的多重性。在這裡，筆者除借用傅柯和布赫迪厄對知識與權力的思考觀點外，亦援引姚斯（Hans Robert Jauss, 1921~1997）的接受美學理論作為探討的切入點，期能瞭解清代臺灣文人的詩歌創作觀與詩歌審美論。

基於上述所提及的種種問題面向，本書所要探析的「詩歌知識論」，擬由詩歌體用論、創作論、審美論等面向展開爬梳、歸納與建構工作，首先考察詩歌知識的來源以及詩歌的本質、功用？繼而探索臺灣文人如何書寫詩歌？又如何評賞詩歌？換言之，在清帝國有秩序地推動文教建設下，臺灣文人是如何將來自中國的文學知識轉化成自我的範疇，並安置在臺灣古典詩歌的知

⁷ 郭令瑾曾撰〈清代臺灣園林詩人〉介紹鄭用錫與林占梅兩位詩人，文中已留意到臺灣園林詩的特殊性，而黃美娥更關注到園林詩以及園林背後交遊網絡所帶來的影響性。參閱黃美娥，《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99），頁281-283。

識系統中，以呈顯屬於臺灣特有的知識系譜，均是本書關注的焦點。

二、想像的系譜

本書「系譜」一詞，是從傅柯「系譜學」(genealogy)的理論觀點啓發而來。傅柯十分關注知識論這一議題，從知識論到知識考掘學的轉變，可以看到傅柯對於傳統知識論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意見。其批評傳統知識論乃是對一些話語的描述，而這些話語是在一個特定時刻內和在一種社會中，作為科學論述而發生作用、同時又作為科學論述而被制度化。傅柯指出知識史的研究目的，不在總結傳統知識的單線發展與追本溯源，而是探討知識形構中區別(division)和局限(limits)的問題，以及探索重建知識基礎的轉變過程。因此，傅柯的「系譜學」，並非試圖要去建構知識的正當產生過程，而是要追問「知識的生成過程」，唯有追溯「知識的生成過程」，才能瞭解知識如何參與權力運作策略的制訂過程，以及知識為統治關係制訂一系列規則、標準及規範的實際活動過程。⁸

傅柯這種「去中心」的系譜學觀點，對筆者最初構思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很具啓發性。尤其清代臺灣古典詩的發展，受中國文學影響至深，筆者絕對無意漠視中國對臺灣的種種影響，但若將詩歌起源於中國的事實，用以全盤論述臺灣古典詩的發展歷

⁸ 在傅柯的理論中，系譜學既是考掘學的修正，亦是其延伸。兩者對知識史的研究目的相同，但方法論則有所差異。參閱高宣揚，《後現代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頁268-333；王德威，〈「考掘學」與「宗譜學」——再論傅柯的歷史文化觀〉，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臺北：麥田出版社，1994)，頁43、頁69-89。

程，那麼便很容易變成中國對臺灣古典詩的影響史，反而忽略「臺灣」的主體性與獨特性。因此藉由探討「知識的生成過程」，而不是建構「知識的正當產生過程」，便是期望可以呈顯清代臺灣古典詩的主體性，並重新定位「清代臺灣」在整個臺灣文學史上的位置。正因清代臺灣的詩歌知識論，其實頗與時代政治、社會、文化環境密切攸關，因此筆者將參酌傅柯系譜學的思考點，去追溯清代臺灣文學場域中知識、權力、主體相互辯證的複雜關係，以及這段詩歌知識是經歷了怎樣的生成歷程，才有今日所見到的詩歌面貌。

立基於此，筆者在嘗試建構詩歌知識論的同時，亦致力於探問清代臺灣古典詩歌是如何生成？以及為何如此發展演變？不過，一如傅柯在系譜學所指出的，要重現歷史的真實全貌有其困難性，任何的考掘與重建，都很難對某一時代或社會作面面俱到的描述。所以，雖然本書在撰寫之初，是試圖從不同的角度與方式，來回應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面貌為何，但最終的研究成果，亦不可能是一面面俱到的論述，只不過是從追溯詩歌的生成歷程，一窺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幾種面向而已。

至於「想像」一詞，實際上指涉的是筆者直觀、直覺的感受。因為清代的臺灣詩壇仍處在原始的學習、摸索階段，在 1895 年以前尚無詩話專著出現，僅有鄭用鑑留下七則論詩的詩話文字，數量甚少，且其中一則〈讀李太白詩題後〉與王漁洋《分甘餘話》幾乎完全相同，顯見王漁洋的影響痕跡。⁹因此論述清代臺灣古

⁹ 就目前資料顯示，清代臺灣沒有詩話專著，故清代臺灣文人論詩時，多半是「以詩論詩」，罕見「以話論詩」，唯一例外者，是鄭用鑑。據詹雅能編校的《靜遠堂詩文鈔》，可以看到幾則詩話文字：〈讀李太白詩題後〉、〈讀杜子美集題後〉、〈讀白香山詩題後〉、〈讀劉賓客詩題後〉、〈蘇東坡詩集題後〉、〈陸放翁詩集題後〉、〈讀黃山谷集題後〉。這些文字多截選前人佳句加以評論，體裁與詩話無異，可惜只有少數

典詩歌知識論如何生成的同時，往往要依據臺灣文人的詩歌書寫內容，以及若干序跋評語，在蛛絲馬跡之中，去建構其人詩歌知識的生成進程與評賞觀點，這之中自然會牽涉到筆者的想像與判斷，但卻也是難以避免之事。

事實上，古典詩歌本是一濃度、高度、美感兼具的文學創作，對沒有「以話論詩」的清代臺灣文人而言，「論詩詩」成爲瞭解其知識論的最佳媒介。那麼，什麼是論詩詩呢？關於論詩詩，楊玉成曾從形式特徵說明論詩詩至少包含以下幾種類型：（一）純粹的後設詩歌，以詩本身爲主題，說明詩爲何物或反射作詩的行爲。（二）詩人現身說法，陳述寫作經驗，建構一幅詩人的自畫像。（三）與詩友的往來贈答，涉及寫作、閱讀、評論乃至詩人的群體意識。（四）詩集、詩卷的題詞。（五）讀後感，閱讀自己或他人詩歌後寫下的詩。大體而言，只要是「以詩論詩」者，都是論詩詩。換言之，論詩詩是某種以詩歌指涉詩歌的後設詩歌（metapoetry），目的在試圖說明：「詩爲何物？」¹⁰然而，論詩詩的本身仍是一詩歌創作，雖然濃縮了詩人對詩歌的觀點與評價，但詩作本身可供探討的空間非常廣闊，故閱讀論詩詩並配合序跋評語的提示，所建構出來的詩歌知識論，難免有主觀的、想像的成分在其中，而這正是本書題目定名「想像的系譜」的原因所在。

幾則，且多是詩評。上述詩話原文，參閱（清）鄭用鑑著、詹雅能編校，《靜遠堂詩文鈔》（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1），頁90-94。關於鄭用鑑詩話內容，及其所對應出來的創作觀，第四章第二節另予探討。有關鄭用鑑〈讀李太白詩題後〉與王漁洋《分甘餘話》的相似處，是筆者在2010年旁聽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侯雅文老師開設的「明清時期臺灣古典詩學專題」，經侯雅文老師點明並指出鄭用鑑〈讀李太白詩題後〉有標點、漏字等失誤處。在此不敢掠老師之美，對老師的啟發，特此致謝。

¹⁰ 楊玉成，〈後設詩歌：唐代論詩詩與文學閱讀〉，《淡江中文學報》第14期（2006.6），頁64-65。

綜合前述，本書的研究目的可歸納出幾點：其一，觀察「從中國到臺灣」這一單線的文化／文學移植過程，瞭解詩歌知識傳播、流通來臺的結果，以及權力究竟對臺灣古典詩產生何種影響，揭示詩歌知識是如何在此秩序空間中被構成並散佈。其二，藉由審視清代臺灣文人如何認識詩、如何寫詩、如何評賞詩，從詩歌的本質、功用、創作、審美等面向，考察清代臺灣詩歌知識的生成歷程，以建構臺灣古典詩歌的知識系譜。其三，藉此詩歌知識論的重建，期能以另一種方式與理解，去回應「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面貌為何」的問題。

第二節 研究範疇與材料

本書研究論題主要在建構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知識系譜，就時間而言，論述範疇為康熙 22 年（1683）清領臺灣開始，到 1895 年乙未割臺為止；就研究對象而言，主要是以臺灣文人為主，觀察在臺灣土生土長的本土文人，其詩歌知識是如何開始，又如何生成。當清代臺灣文人的詩歌知識，落實到具體的書寫實踐時，其創作態度與審美傾向，又呈現怎樣的面貌。當然，要論臺灣古典詩，不能不留意到宦遊文人的重要性，但本書既是要建構「臺灣」古典詩的知識論，則當以「臺灣」為本位。宦遊文人固然很重要，也有深刻影響臺灣文人之處，但一如前文所提及的，臺灣社會從移墾到文治的轉變過程中，一個象徵臺灣已步入文治社會的重要指標，是「臺灣文人」的文學素養明顯提升，而「能詩」更是其中的重要關鍵，因此本書研究對象便落在臺灣文人身上，而非宦遊文人。事實上，宦遊文人來自中國各地，其詩歌知識的養成自有其脈絡，難以與臺灣文人等同論之，但宦遊文人入臺後

對臺灣文壇以及臺灣文人所造成的影響，亦將是觀察的背景面向之一，期能瞭解宦遊文人對臺灣文人的啓發何在。

至於，為何以「清代」為時間斷限，而非以臺灣古典文學的開端——明鄭時期為起始，箇中原因是臺灣本是一移墾社會，明鄭時期的短暫歷史在尚未培育出任何臺灣文人便宣告結束，而本書既以臺灣文人為主要研究對象，是以雖然臺灣古典文學由海東文獻之祖——沈光文開其端，但明鄭時期既沒有出現任何臺灣本土文人，也沒有任何臺灣本土文人的詩作，更遑論臺灣文人的詩歌知識，故自然從孕育臺灣文人的時空背景談起，因此時間斷限方以清代臺灣為主，即康熙 22 年（1683）至乙未割臺 1895 年。

清領臺灣共 212 年，雖最後結束於 1895 年，但文學的發展往往無法隨著改朝換代而迅速轉變，許多面臨乙未割臺的臺灣文人，橫跨了清朝與日本兩個統治時代，如施士潔、丘逢甲、許南英等人即是，其詩歌作品也有割臺前與割臺後的區別。照理來說，依照本書的時間範疇，割臺後的詩歌作品應該不予列入討論，然而，文學的發展既無法也不可能驟斷，許多割臺後的詩作或詩文評論，對於理解割臺前的臺灣文學現象實有一定助益，故筆者在觀察清領時期臺灣詩歌潮流的演變時，亦將參酌對照作為佐證之用。重新探討「清代」的臺灣古典詩歌，最重要的意義，乃在於「清代」對臺灣文人的詩歌認識而言，是「起點」的開始，臺灣文人如何學詩、如何寫詩，甚至如何體會、品評詩，都是在「清代」這 212 年中學會。因此，筆者在試圖建構清代的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時，也等同於探究臺灣文人詩歌知識的重要源流與生成過程，而最終目的，便是為瞭解清代臺灣古典詩是「為何」以及「如何」這樣發展演進。

由於清領臺灣的時間非常漫長，孕育的臺灣文人、累積的詩歌作品也十分豐富，因此留下相當龐大的文學資產可供研究。而

在經過許多前輩學者的努力耕耘下，這些豐富的文獻材料也已集纂成冊並出版問世。正因有前輩學者的基礎成果，筆者方有完整的資料可供參考，以下將主要利用的文獻資料稍作說明：

一、《全臺詩》21 冊

《全臺詩》1 至 5 冊於 2005 年出版，6 至 12 冊於 2008 年出版，7 至 21 冊於 2011 年出版，並有「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電子資料庫免費提供檢索，對研究者而言甚為便利。¹¹21 冊《全臺詩》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鄭用錫與林占梅兩人的部分。鄭、林二人是臺灣重要本土詩人，但以往流傳的鄭用錫詩集，都是由楊浚修改過的刊本，並非原始的手稿本，《全臺詩》將鄭用錫詩集的刊本與手稿本完整呈現，對後人的研究助益甚大，也能避免引用鄭用錫手稿本但卻無法標明頁碼的困擾。而林占梅《潛園琴餘草》因版本較多，《全臺詩》在校對之餘，亦完整呈現不同版本的詩歌面貌，提供研究者參考。整體而言，《全臺詩》在版本蒐羅上不遺餘力，對臺灣古典詩的研究者來說，無疑是最重要的參考文獻，筆者在論文中所引用的詩歌，基本上亦是以《全臺詩》為主。然而，儘管《全臺詩》已盡力蒐羅各版本並進行校勘，但偶亦難免有缺誤之處，如第 5 冊所收陳維英詩作，應以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所藏陳維英《偷閒錄》手抄本共 3 冊最為完整，只是手抄本難以標明頁數，故筆者在引用上仍以《全臺詩》標明頁數，同時參校臺灣分館的手抄本。此外，《全臺詩》共 21 冊，難免有因音近或形近所產生的文字錯誤，此或是校對的疏漏，故筆者引用時，在對照最佳版本並確認是《全臺詩》文字有誤時，會以註釋

¹¹ 「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http://xcm.nmtl.gov.tw/twp/b/b02.htm>。

方式說明，並改正原文，以免繼續沿用錯誤詩句。

另要說明的是，本書所致力建構的詩歌知識論，乃是以清代的臺灣文人為研究對象，探討其詩歌知識的生成歷程。然而由於清代臺灣並無詩話專著出現，故要觀察清代臺灣文人的詩歌觀，必須透過眾多的論詩詩與相關的序跋評語來一探究竟。正因為論詩詩投射出詩人的詩歌觀，也建構出詩人的自我形象與群體意識，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這些數量眾多的論詩詩，多半都在《全臺詩》的收錄範疇裡。只是，《全臺詩》的收錄重點是臺灣古典詩歌，相關的序跋評語並沒有收入，因此仍須參看臺灣文人的個人詩文集。

二、個人詩文集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的《臺灣文獻叢刊》，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重新影印的《臺灣歷史文獻叢刊》，收錄許多臺灣文人的個人詩文集，完整保留序跋評語等資料。目前《臺灣文獻叢刊》亦有「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對查詢臺灣方志與詩文集內容，十分方便。¹²只是，《臺灣文獻叢刊》與《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在收錄清代臺灣文人的詩文集時，有些僅收錄部分作品而有「簡編」之名，如章甫的《半崧集簡編》、林占梅的《潛園琴餘草簡編》。儘管簡編的詩作內容已有刪減，但這部分有《全臺詩》可以補足，故筆者在引用《臺灣文獻叢刊》與《臺灣歷史文獻叢刊》的詩文集時，主要是援引詩文集前後的序跋評語，而非詩作內容。此外，龍文出版社所出版的《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亦有清代臺灣文人的詩文集可供對照，如施瓊芳《石蘭山

¹² 「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http://hanji.sinica.edu.tw/index.html?tdb=臺灣文獻叢刊>。

館遺稿》、李逢時《泰階詩稿》、陳肇興《陶村詩稿》、李望洋《西行吟草》、鄭如蘭《偏遠堂吟草》等，均是較好的版本。而鄭用鑑與林占梅的個人詩文集，則以詹雅能編校的鄭用鑑《靜遠堂詩文鈔》、徐慧鈺所編《潛園琴餘草》最為完整。但由於以上詩作內容均收錄在《全臺詩》中，因此除非《全臺詩》所收詩作內容有誤，否則均標明《全臺詩》的冊數頁碼以爲統一。另，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也藏有珍貴的手稿資料，如章甫的《半崧集》、陳維英的《偷閒錄》、¹³林占梅《潛園琴餘草》、黃敬《觀潮齋詩集》等，均有助參照。至於身跨 1895 年的臺灣文人詩文作品，主要參考龍文出版社的《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與陳支平主編的《臺灣文獻匯刊》，以補《全臺詩》之不足。

三、清代臺灣方志

清代臺灣古典詩的發展演變，與政治、社會等諸多背景相互牽涉，方志所保存的歷史文獻，如學規、奏疏、序跋、碑記、雜記、賦、文……等，不僅有助於瞭解清代臺灣的歷史背景與文教發展概況，對於臺灣文人的養成，與詩歌知識的形塑，亦提供重要的觀察視角。臺灣本爲一移墾社會，從文學沙漠轉變成詩人輩出的海上島嶼，實有賴清帝國的政令措施。而要瞭解這一段「從中國到臺灣」所進行的文化／知識移植與傳播等面向，不得不依賴方志所提供的種種史料。至於本書所使用的方志版本，以文建會、遠流出版社刊行之《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爲主，並參酌《臺

¹³ 《全臺詩》第 5 冊所收陳維英《偷閒錄》共 290 首，以廖漢臣刊於《臺北文物》者爲底本；但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所藏陳維英《偷閒錄》手抄本更爲完整，共有 452 首詩。關於陳維英《偷閒錄》的版本狀況，參閱謝碧菁，《陳維英生平及其詩歌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頁 29-30。

灣歷史文獻叢刊》。

四、詩話

「以話論詩」的詩話專著，因能以隨筆的方式闡明個人的詩學觀點與評賞態度，故受到許多文人的青睞。儘管多數詩話的結構並不嚴謹，但從中實能反映出詩人的詩學知識，及當時的詩風傾向，對於瞭解詩歌本質、詩歌創作、詩歌美學等有相當助益。依照目前所存文獻來看，清代臺灣沒有任何的詩話專著問世，但 1895 年乙未割臺後，不僅詩社林立，詩話專著也大量出現，如蛻菴老人《大屯山房譚薈》、王松《臺陽詩話》、吳德功《瑞桃齋詩話》、洪棄生《寄鶴齋詩話》、胡天奎《鐵峰詩話》、連橫《臺灣詩乘》、胡南溟《大冶一爐詩話》等，宣告臺灣古典詩歌的發展步入較為成熟的階段。這些詩話的作者，生平橫跨 1895 年，對同光時期臺灣文人的印象尚深，且本身亦有詩學涵養，故所撰詩話不僅可以觀察臺灣的種種文學現象，還能從詩話所顯現的個人詩學觀，與清代臺灣文人的論詩詩作一相互對照，以理解臺灣古典詩歌的發展脈絡。

第三節 研究回顧

有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研究現況，在 1990 年以前，此方面的學術著作可謂寥寥無幾。最早是 1980 年王文顏的碩士論文《臺灣詩社之研究》，¹⁴這是第一本對臺灣詩社進行全面考察的著

¹⁴ 王文顏，《臺灣詩社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0）。

作，提供許多基礎性的參考。同年，還有周滿枝的碩士論文《清代臺灣流寓詩人及其詩之研究》，¹⁵以流寓詩人（即宦遊文人）為對象，分析其來臺之因與所作詩歌的主題表現，在當時甚少人關注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時候，是書的出現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至於最早的臺灣古典文學史著作，當推 1983 年廖一瑾的博士論文《臺灣詩史》，¹⁶此書概述了明鄭至日治時期的臺灣古典文學發展，在各階段挑選代表作家加以評述、比較，企圖再現「臺灣詩史」的脈絡。

1990 年以後，相關研究成果逐漸遞增，儘管增加的速度其實頗為緩慢，但亦有代表著作問世，如 1991 年施懿琳的博士論文《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¹⁷施懿琳以一貫嚴謹的態度，從清帝國治臺提升臺灣文風的背景入手，區分流寓詩人與本土詩人的身分，並分析詩歌題材及所呈現的臺灣社會，最後具體說明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價值與特色。施懿琳的論述有許多創見，至今仍為學界所引用，足見其重要性。到 2000 年以後，有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研究已明顯大增。以下，便分從各面向回顧 1991 年之後的相關撰述：

一、作家作品論

目前有關清代重要宦遊文人及臺灣本土文人的微觀研究頗為可觀，如郁永河、孫元衡、章甫、劉家謀、陳肇興、鄭用錫、

¹⁵ 周滿枝，《清代臺灣流寓詩人及其詩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0）。

¹⁶ 廖一瑾，《臺灣詩史》（臺北：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3）；又見廖一瑾，《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

¹⁷ 施懿琳，《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1）。

林占梅、陳維英、施瓊芳、施士洁、許南英……等，¹⁸均有碩博士論文深入剖析。這些論文以其微觀且細緻的研究方式，探析個別作家作品的特殊之處，為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宏觀視角，奠下良好基礎。除了學位論文外，其餘單篇論文論及清代重要詩人詩作者，數量更多，在此不一一列舉，此類單篇論文與學位論文相

¹⁸ 陳虹如，《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1）；郭侑欣，《憂鬱的亞熱帶：郁永河《裨海紀遊》中的臺灣圖像及其衍異》（臺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吳玲瑛，《孫元衡及其《赤嵌集》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張永錦，《孫元衡詩探析》（臺中：中興大學中文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4）；張月女，《韋甫生平及其《半崧集》詩歌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黃淑華，《劉家謀宦臺詩歌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蔡寶琴，《海音詩俗語典故分析》（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賴麗娟，《劉家謀及其寫實詩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林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臺中：弘祥出版社，1999）；顧敏權，《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研究》（中壢：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謝志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1995）；薛建蓉，《清代臺灣仕紳角色扮演及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臺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范文鳳，《鄭用錫暨其《北郭園全集》研究》（中壢：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7）；徐慧鈺，《林占梅先生年譜》（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0）；徐慧鈺，《林占梅園林生活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2）；謝碧菁，《陳維英生平及其詩歌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楊添發，《陳維英及其文學研究》（臺北：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余育婷，《施瓊芳詩歌研究》（永和：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向麗頻，《施士洁及其文學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陳淑美，《施士洁及其《後蘇龕合集》》（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7）；楊明珠，《許南英及其詩詞研究》（臺北：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賴筱萍，《許南英及其窺園留草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

輔相成，均提供細緻深刻的文本解讀。再進一步說，現在廣為人知的詩家風格，如郁永河俚而不俗的風土詩，孫元衡標新立異的僻字奇句，章甫重視聲律與妙悟的美感特質，劉家謀的寫實精神，陳肇興的本土關懷，鄭用錫、陳維英平淡兼具理趣的風格，以及林占梅的園林文學，施瓊芳的雅正美學，都是上述作家作品論的研究成果，值得重視。

二、區域文學史

第一部臺灣區域文學史，為 1995 年施懿琳與楊翠合著的《臺中縣文學發展史》，¹⁹清代古典文學僅佔其中一部份。1997 年施懿琳與楊翠繼續合著《彰化縣文學發展史》，²⁰此後書寫區域文學史的風氣逐漸形成：1998 年有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²¹龔顯宗〈安平文學史〉，²²1999 年有陳明台《臺中市文學史初編》、²³黃美娥的博士論文《清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²⁴2006 年龔顯宗又撰《臺南縣文學史》，²⁵可與〈安平文學史〉相互參看。上述區域文學史的著作，均涉及到清代臺灣各地區的古典詩歌發展情形，但關涉程度最密切者，當推黃美娥《清代竹塹

¹⁹ 施懿琳、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

²⁰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

²¹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臺北：里仁書局，1998）。

²² 收入龔顯宗，《臺灣文學研究》（臺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²³ 陳明台，《臺中市文學發展史初編》（臺中市：臺中市立文化中心，1999）。

²⁴ 黃美娥，《清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²⁵ 龔顯宗，《臺南縣文學史》（臺南縣：臺南縣政府，2006）。

地區傳統文學研究》。其將清代北臺灣的古典文學發展作一完整的勾勒，且挖掘出許多珍貴的史料，深入探討竹塹地區文人社群的交遊網絡，及作家作品的特色所在，深度與廣度具備。之後，區域文學史的學位論文日多，澎湖、鳳山、南投、基隆、苗栗、宜蘭等地均有相關論述。²⁶足見撰寫區域文學史，對整體的宏觀視角而言有基礎性貢獻。

三、階段文學史與古典文學史

清領臺灣 212 年中，共經歷康、雍、乾、嘉、道、咸、同、光等八個時期，一般多以本土文人崛起的「道咸時期」為分界點。道咸以前，臺灣古典詩歌的發展趨勢幾乎由宦遊文人主導；道咸以降，本土科舉社群出現，才逐漸翻轉這個局面。現今階段文學史的學位論文有兩部，²⁷一是吳毓琪《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研究》；²⁸二是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

²⁶ 葉連鵬，《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中壢：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王俊勝，《清代臺灣鳳山縣詩歌研究》（臺北：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張淑玲，《臺灣南投地區傳統詩研究》（臺北：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2003）；吳淑娟，《臺灣基隆地區古典詩歌研究》（臺北：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高雪卿，《臺灣苗栗地區古典詩研究》（臺北：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2005）；林麗鳳，《詩說噶瑪蘭，說噶瑪蘭詩——清代宜蘭地區古典詩研究》（臺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6）；陳麗蓮，《蘭陽地區傳統文學研究（1800-1945）》（宜蘭：佛光大學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

²⁷ 謝志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1995），基本上仍屬作家作品論，故不在此討論。

²⁸ 吳毓琪，《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作研究》。²⁹吳毓琪以康熙時期為研究範疇，主要著重在康熙年間的宦遊詩歌，是「臺灣詩歌起源發展的原型特徵」；³⁰而許惠玫選擇道咸同時期，則是因「道咸同時期」乃本土文人崛起之重要階段，故文中論述不斷標舉臺灣「在地性」與「本土性」的重要。

除了階段文學史外，尚有整體性的臺灣古典文學史論述，如汪毅夫、劉登翰等著《臺灣文學史》，³¹其中與清代臺灣古典詩歌有關者為第一編及第二編，此書因成書時間較早，整體內容偏向概述性質。此外，黃美娥〈臺灣古典文學史概說（1651-1945）〉一文，雖亦為概述性質的單篇論文，但不少論點極具新意，如以「文學符碼」的角度審視臺灣古典詩歌中的鄭成功書寫面向，又分析乾嘉至同光時期的臺灣本土文人時，觀察臺灣古典文學在此階段已形成不同的區域特色，並提及臺灣文人對詩歌本質的認識，是詩人不執意於區分唐宋的原因。³²這些創見，對筆者有極大啟發。

四、詩歌主題研究

清代臺灣古典詩有幾個特殊的主题，始終倍受矚目，如風土、八景、自然、民變、宦遊……等題材。以風土詩為主题者，有翁聖峰的《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³³是書詳細考察竹枝詞的

²⁹ 許惠玫，《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

³⁰ 吳毓琪，《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研究》，頁9。

³¹ 汪毅夫、劉登翰等，《臺灣文學史》（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

³² 黃美娥，〈臺灣古典文學史概說（1651～1945）〉，《臺北文獻直字》第151期（2005.3），頁215-269；又見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頁1-60。

³³ 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

源流與文體、形式，細膩勾勒竹枝詞從唐至清的演變，以及與臺灣社會文化的關係，對本書探究「從中國到臺灣」的文學移植與傳播過程，有相當助益。

八景書寫，理應歸於自然主題一類，但臺灣八景詩有其特殊之處，故特別標出。此類有劉麗卿《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³⁴是書詳細彙整臺灣各地八景在清代的發展變化，剖析八景詩的作者組成與作品特色。稍後，屬於自然主題的陳佳姘《清代臺灣記遊文學中的海洋》，³⁵與〈滾滾波濤聲不息，斐然有緒煥文章——論清代八景詩中的自然景觀書寫〉，³⁶更進一步分析臺灣八景在帝國文化的制約下，早已變成一種「被馴服的風景」，蘊含深刻的政治寓意，也是宦遊文人在面對陌生環境時，試圖將他方轉為家鄉一種文學及美學式的努力。此後，從「帝國之眼」或「樂園空間」的角度探討臺灣八景詩，幾成必備論述。許玉青《清代臺灣古典詩之地理書寫研究》，³⁷也有專章論及八景書寫，結論相去不遠。此外，還有蔡清波《臺灣古典詩自然寫作研究——明鄭時期至清朝時期》、³⁸楊淑惠《臺灣古典詩中的玉山書寫》、³⁹黃惠鈴《清領時期臺灣古典詩山岳形象研究》、⁴⁰戴雅芬《臺灣天然災害

³⁴ 劉麗卿，《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

³⁵ 陳佳姘，《清代臺灣記遊文學中的海洋》（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

³⁶ <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t/tan-ka-bun/pak-keng-si.htm>，2010.3.10 上網。

³⁷ 許玉青，《清代臺灣古典詩之地理書寫研究》（中壢：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³⁸ 蔡清波，《臺灣古典詩自然寫作研究——明鄭時期至清朝時期》（高雄：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³⁹ 楊淑惠，《臺灣古典詩中的玉山書寫》（臺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⁴⁰ 黃惠鈴，《清領時期臺灣古典詩山岳形象研究》（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類古典詩歌研究——清代至日據時代》⁴¹等學位論文，對如何觀看、想像臺灣自然，有不同的解析面向，可供參看。

關於民變主題，吳青霞《臺灣三大民變書寫研究——以古典詩文為主》，⁴²從詩文去觀察清代三大民變——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之亂，比較統治階層與本土文人的書寫異同，突顯臺灣的在地意識。屬於宦遊文學一環者，有謝崇耀《清代臺灣宦遊文學研究》，⁴³此書較著重於文獻資料整理，偏向基礎性研究。還有藍偵瑜《清代來臺文人之臺灣特殊性書寫》，⁴⁴所謂臺灣特殊性，即是宦遊文人在中國罕見、在臺灣常有的各種經驗，如渡海、臺灣的自然人文等，呈顯宦遊文人眼中的臺灣形象為何。

五、詩話研究

以目前現存的文獻資料來看，清代臺灣文人尚未有任何詩話專著，要到日治以後詩話專著才大量出現。日治時期的詩話著述呈顯了當時臺灣文人的詩學理論，從中能夠看見臺灣文人的詩歌觀為何，並與清代臺灣文人的詩歌認識作一觀察對照，是以在此亦回顧臺灣詩話的研究成果。目前關於日治臺灣詩話的碩士論文與專書有：許雯淇《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⁴⁵李知灝《吳

⁴¹ 戴雅芬，《臺灣天然災害類古典詩歌研究——清代至日據時代》（臺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1）。

⁴² 吳青霞，《臺灣三大民變書寫研究——以古典詩文為主》（臺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⁴³ 謝崇耀，《清代臺灣宦遊文學研究》（臺北：蘭臺出版社，2002）。

⁴⁴ 藍偵瑜，《清代來臺文人之臺灣特殊性書寫》（臺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⁴⁵ 許雯淇，《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

德功《瑞桃齋詩話》研究》、⁴⁶林美秀《傳統詩文的殖民地變奏：王松詩話與詩的現代詮釋》、⁴⁷吳東晟《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⁴⁸陳怡如《回歸風雅傳統——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⁴⁹謝崇耀《日治時期臺灣詩話比較研究》。⁵⁰從中可以看到洪棄生的《寄鶴齋詩話》研究成果最多，此與《寄鶴齋詩話》的詩學理論建樹較多有關。上述研究成果，對本書觀照清代臺灣的詩歌知識系譜，均有助益。

六、其他

江寶釵於1999年出版的《臺灣古典詩面面觀》⁵¹一書，是第一部分自覺要從體系建構著手，來探討臺灣古典詩歌的學術著作。作者運用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從作者論、宇宙論、作品論三個角度考察臺灣古典詩歌的種種面向，時間橫跨明鄭、清領、日治時代。是書的研究路徑對本書的整體構思極具啟發性，而江寶釵運用中西文學理論來解讀文本，更值得學習。隔年2000年問世的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⁵²亦是研究臺灣古典文學必讀的一部專著。該書縱貫

⁴⁶ 李知灝，《吳德功《瑞桃齋詩話》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⁴⁷ 林美秀，《傳統詩文的殖民地變奏：王松詩話與詩的現代詮釋》（高雄：太普公關事業有限公司，2004）。

⁴⁸ 吳東晟，《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臺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⁴⁹ 陳怡如，《回歸風雅傳統——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⁵⁰ 謝崇耀，《日治時期臺灣詩話比較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⁵¹ 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年）。

⁵²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

探討明鄭到日治時期的臺灣古典文學發展，對古典詩著墨尤多，儘管內容偏重日治時代，關於清代臺灣古典詩的部分較少，但其研究觀點與論述手法，亦開啓清代臺灣古典文學的不同觀察面向。此外，2010年顧敏耀的博士論文《臺灣古典文學系譜的多元考掘與脈絡重構》，⁵³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考掘學與系譜學的觀點，以及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地下莖（Rhizome）概念，對整體的臺灣古典文學作脈絡的重構，從清領時期陳肇興所記述的戴潮春事件開始，到戰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逐一考掘，企圖開展不同的研究觀點。

整體而言，目前關於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研究，儘管有許多論述從各種角度切入，去呈顯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面貌，但多半仍集中在作家作品研究、區域性研究、文學史研究、主題性研究。有鑑於此，在回顧清代臺灣古典詩的研究現況後，發現前人的論述成果固然十分豐碩，但目前卻尚未有任何學術著作從「詩歌知識如何生成」這個視角進行分析，是以藉由探究臺灣古典詩歌的知識論為何，或許能提供不一樣的觀點，瞭解臺灣古典詩的各種面貌。循此，筆者意欲在前人奠定的研究基礎上，從一個較為宏觀的視野出發，參佐傅柯「系譜學」的思維觀點，與布赫迪厄場域、慣習、資本等概念，藉由「詩歌知識如何生成」的回溯觀察，重新思考如何建構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系譜，並開展不同的研究面向。

春暉出版社，2000）。

⁵³ 顧敏耀，《臺灣古典文學系譜的多元考掘與脈絡重構》（中壢：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

第四節 研究方法

一如前述，筆者的初步構思，實受惠於傅柯與布赫迪厄針對知識論與知識生產所提出的相關論述，不論是傅柯的考掘學或系譜學，還是布赫迪厄的場域、慣習等概念，都已充分說明權力與知識之間的複雜關係，而這也將是筆者在觀察詩歌知識的生成歷程時，必須留意的面向。此外，姚斯的接受美學理論，對於探討清代臺灣文人如何接受典範詩人的作品，以及接受之後產生怎樣的群體共識，亦有很大助益。姚斯談接受美學的同時，不忘強調歷史與社會的重要性，並指出：「文學史不只是描述某一時期的作品反映出的一般歷史過程，而是在『文學演變』過程中發現準確的唯屬文學的社會構成功能，發現文學與其他藝術和社會力量同心協力，解放人類於自然、宗教和社會束縛中產生的功能；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跨越文學與歷史之間、美學與歷史知識之間的鴻溝。」⁵⁴正因為文學接受既有歷時性因素，也有共時性因素，所以只有在歷時態與共時態的交叉點，才能顯示出文學的歷史性，並使某一特定時刻的文學視野得以理解。⁵⁵從這樣的研究視角出發，觀察臺灣文人對典範詩人的閱讀與接受，應能進一步理解清代臺灣文人的文學視野，與清代臺灣詩壇的文學現象。

然而，本書「想像的系譜」雖是受到傅柯系譜學的啟發，著重探討知識的生成過程，挖掘知識之所以成立的權力來源。但本書的論述與架構安排，在力求條理清晰、顯而易懂的前提下，對

⁵⁴ 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頁56。

⁵⁵ 參閱金元浦，《接受反應文論》（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頁12-13；胡經之、王岳川主編，《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342。

傅柯「研究瑣碎細節」與「以解構為結果」的操作方式，⁵⁶較難以企及。故在章節的結構安排，筆者將借用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所談的文學批評理論，作為全書的章節架構。之所以如此選擇，在於劉若愚著述此書，已充分意識到研究中國文學批評的困難之處，其中之一是中國的文學理論固然很多，但很少是有系統地闡述說明，且許多論述往往流於「直覺的感性」，⁵⁷儘管這種「直覺的感性」便是中國文學理論的一大特色，卻容易使人感到迷惑甚或是誤解。如對照清代的臺灣詩壇，將會發現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研究亦面臨到同樣的難題。清代臺灣尚未出現任何一部詩話，因此清代臺灣文人對詩歌的理解、認識，自然不乏「直覺的感性」這一面；更甚者，還可以進一步地說，在日治時期出現的眾多詩話，亦未必就是有條理地「以話論詩」。是以，如何在眾多的文獻資料中將之整理出秩序，則需要較有系統的章節安排。⁵⁸也因如此，筆者相信借用劉若愚審慎思考過的《中國文學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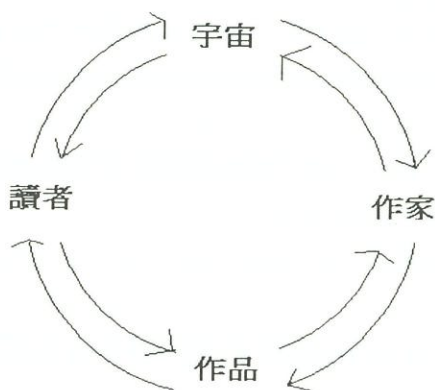
⁵⁶ 關於傅柯系譜學的具體化操作方法，參閱邵軒磊，〈作為研究方法的系譜學〉《政治科學論叢》第34期（2007.12），頁163-166。

⁵⁷ （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頁7。

⁵⁸ 劉若愚為克服中國文學理論的直覺式批評所引發的困難，從西方文學理論的不同視角出發，重新闡釋中國文學與文論，使之成為一有秩序的文學批評理論，可與西方文學理論相互照映。劉若愚清楚說明撰著《中國文學理論》有三個目的：一是提出中國批評思想傳統的各種文學理論，使它們能與來自其他傳統的理論比較，從而有助於達到世界性的文學理論。二是為研究中國文學與批評的學者，闡明中國的文學理論。三是藉由闡明中國文學的各種批評理論，進而可與西方文學的批評概念、方法與標準作一綜合性的分析比較，避免以起源於西方文學的批評標準，完全應用到中國文學上。然而，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立意固然良好，但劉若愚將中國傳統批評分成六種文學理論：形上論、決定論、表現論、技巧論、審美論、實用論，在區分上亦存在問題。如此區分許是為了方便論述，但劉若愚也自承：「這些理論並非必然互不兼容，而是經常相互關聯的，因為不同的理論可能起於同一來源。」參閱（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頁

架構安排，將能使所欲建構的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以一種較清楚、明白的面目呈現出來。

劉若愚依據艾伯拉姆斯（M. H. Abrams）在《鏡與燈》（The Mirror and the Lamp）一書中所設計的藝術作品的四要素——作品、藝術家、宇宙、觀眾，重新以不同方式安排，使之可以應用於中國文學批評，其修改後的圖表如下：



在這個非常著名的圖表中，劉若愚表示這四個要素之間的關

2-6、18-19。正因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對於建立中國文學理論體系有其貢獻，但其缺失之處已有許多前輩學者指出，故筆者在借用劉若愚的六種文學理論作為本書的架構安排時，並非完全按照其六種理論分項探討，而是另作安排運用，以體用論、創作論、審美論三個面向，架構清代臺灣詩歌知識論的主軸。至於臺灣前輩學者評論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的優缺點，參閱康來新、顏崑陽、蔡英俊、龔鵬程討論、陳益源紀錄，〈建立一個中國文學理論體系——會評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國文天地》2卷4期（1986.9），頁20-24；黃慶萱，〈劉若愚《中國文學本論》內容析議〉，《中國學術年刊》第19期（1998.3），頁483-519；黃慶萱，〈劉若愚《中國文學本論》架構方法析議〉，《國文學報》第27期（1998.6），頁271-306。

係，是構成藝術過程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宇宙影響作家，作家反映宇宙。由於這種反映，作家創造作品，這是第二階段。當作品觸及讀者，它隨即影響讀者，這是第三階段。在最後一個階段，讀者對宇宙反映，因他閱讀作品的經驗而改變。」⁵⁹這四個階段，既是所有藝術過程必經的階段，自然也會是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生成的必經階段。然而，不同於劉若愚區分形上理論、決定理論、表現理論、技巧理論、審美理論、實用理論等，筆者依據所閱讀的詩歌及文獻資料，參用劉若愚對各理論的分析，將之運用到本書章節架構時，並非按部就班地順序排列資料，而是另作安排運用，以求適用於既有文獻。故書中先探討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生成與典律的形塑，作為時空背景的觀察，再從體用論、創作論、審美論三面向著手。

以下，是實際進行的步驟，以及各章涉及的內容面向：

一、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的移植與傳播

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生成背景，與清帝國的文教建設、宦遊詩歌入臺息息相關，而這兩大背景因素，也導致詩歌典律的形成。以布赫迪厄對知識生產的論述來看，當文化生產的場域形塑出慣習的同時，慣習也影響到每一個知識生產者的認知系統與品味愛好，這也解釋了詩歌典律「為何」以及「如何」生成的原因。

臺灣古典詩歌典律的形成，首先來自於清帝國致力將漢文化移植至臺灣時，對「科舉考試」與「政教風土」的重視。科考對臺灣古典詩歌的影響，發展出典雅美學的特色；而方志藝文志篩選詩歌作品的標準，又與科舉考試帶來的文學傾向緊密扣合，難

⁵⁹ (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頁14。

免侷限臺灣文人的詩歌創作。學校／書院文化場域的潛移默化，與方志藝文志的規範準則，早已構成一個極有秩序的詩歌知識體系，但臺灣古典詩歌系譜的建構並非如此簡單，同時來臺的宦遊詩歌也在此知識版圖的形塑過程，發揮極關鍵的影響。臺灣古典詩最突出的兩大主題——風土與八景，正是由宦遊文人引導所致。由此，可以清楚看到臺灣詩歌知識系譜的形成，儘管有多種面向、多種主題相互交錯、辯證，但從中卻明顯揭示了權力主導文學知識的跡象，而詩歌典律也就在此權力／知識交錯縱橫的網絡中逐漸形塑。

二、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體用論

詩的本質是什麼？詩的作用又是什麼？「體用論」這個問題，事實上正是藝術過程第一階段的核心，筆者將借用劉若愚的形上理論、決定理論與表現理論，來為詩歌體用論稍作分梳。⁶⁰文學既是宇宙的顯示，那麼宇宙是什麼？在中國，宇宙往往以「道」稱之，故作者如何瞭解「道」？「道」是什麼？便是一個回歸到最原點的問題。而放在詩歌知識論的體系中，也很適合用來詢

⁶⁰ 第一階段探討的是宇宙與作家的問題，包含劉若愚所提出的形上理論、決定理論與表現理論。形上理論的要點，是在問「宇宙是什麼？」故置於第一階段並無問題。而決定理論則將宇宙視為人類社會，不是普遍存在的道，如用中國文學批評裡的傳統說法來解釋，即文學反映政治社會。所謂表現理論，簡單地說即文學是人類性情感受的表現，至於「性情」是什麼？隨著中國對「性情」觀念的解釋，則有政治道德之情，與性靈真我之情。劉若愚在文中反覆說明形上理論、表現理論與決定理論的異同，認為形上理論、決定理論屬第一階段，而表現理論則轉到第二階段——作家與文學作品之關係，但本書在探究詩歌的本質、作用時，亦會牽涉到「詩寫性情」，故均置於第一階段討論，以較清楚看出臺灣文人的「文學觀」為何。參閱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頁21、74、93-130。

問：清代臺灣文人眼中的「詩歌」，其本質究竟代表著什麼？有何作用？一直以來，中國對詩歌的本質、功用有幾種理解：首先是儒家傳統的「詩言志」說，詩有「興、觀、群、怨」的作用。到了六朝，陸機提出「詩緣情」，成為魏晉文人的共識。此後，「詩言志」與「詩緣情」變成中國詩歌批評的兩大重點。及至明清，究竟詩是重在表達「社會共我之情」，還是「個我之真性情」，議論分歧，格調與性靈的對峙，其根本也是對詩歌的本質、作用認識不同。

那麼，回到清代臺灣文人的身上，從其論詩詩來看，可以很明顯的發現，他們對詩歌的「情」是什麼，並沒有那麼壁壘分明，很多時候臺灣文人甚至會出現矛盾或模稜兩可的話語，凡此在在證明他們對於詩的本質是什麼，看似採取一種兼容並蓄的態度，但實際上還停留在模糊的階段，並非自覺地、有意識地去融合兩種「情」。如再以 1895 年以後出現的多部詩話對照觀察，則日治時期的臺灣文人已清楚知道兩種情的不同，且各自標榜，反覆論說。從清代、日治臺灣文人對詩歌本質認識的不同，可以知道「清代臺灣」的詩歌體用論，對整個臺灣古典詩史而言，是一個重要的起始階段，而混沌、模糊的詩歌認識，正是這個階段的重要特色。但，若臺灣文人沒有經過這個最原始的摸索階段，又如何能過渡到日治時期的百花齊放？

至於詩歌的功用為何？由於詩本有教化、抒情、酬酢等作用，這些作用基本上又與詩歌本質相互勾連。筆者在閱讀資料中，觀察到臺灣古典詩有三種主要功用：一是從「回歸詩教的美刺話語」出發，瞭解詩歌的教化作用，以及儒家詩學中實用觀的呈現。二是從詩人大量的「抒情言志」的詩歌話語，觀察臺灣文人在抒發個人情感的同時，是如何以詩人的身分，表述出何謂詩人？綜合來看，詩的抒情功能，折射出詩人的主體性，也形塑了

詩人的形象特質，究竟臺灣文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詩人」形象，頗值得關注。三是從詩歌「酬酢社交」的功能，看詩歌網絡與文學社群的形成，以及其中形塑出怎樣的群體意識。最後，當詩歌作為一種象徵資本時，這群能創作詩歌的詩人，又佔據了怎樣的社會／文化位置，並產生何種力量。這些問題，是詩歌知識論最基礎的一環，因此，體用論的重新探討，便成為瞭解清代臺灣文人的詩歌知識是如何開始，又如何生成的核心所在。

三、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創作論

接續在「體用論」之後，是詩歌的「創作論」，也是藝術生成的第二階段：作家創造作品。劉若愚的技巧理論，分析了作家創造作品的種種技巧，以之對應到清代臺灣文人的詩歌書寫，可以看到臺灣文人創作詩歌的態度有：

（一）詩歌學問化的創作傾向。臺灣文人不斷強調讀書破萬卷，有學養方能作好詩。積學，事實上也是清代中國特殊的文學現象，在重學的學術風氣下，以學問考證充實詩歌內容，是清代詩壇常見的文學現象，所謂「學人之詩」即是。臺灣文人雖然沒有在詩歌中特別標榜學人之詩，但在乾嘉考據學風的影響下，以及對宋明理學的涵養，「詩人」與「學人」幾乎是可以劃上等號的，而「讀書」當然也成為臺灣文人作詩的先決條件。

（二）格調／性靈的相互影響。從臺灣文人的詩歌中，往往會看到其對詩的格律聲調與「溫柔敦厚詩教」的重視，但又不忘提及「真性情」的可貴，因此如何在格調的規範下，展現詩人的真性情，成為臺灣文人創作詩歌的基本態度。而再仔細觀察，將會發現這樣看似圓融的創作方式，實際上亦源自於對詩歌本質的模糊認識。

(三) 臺人眼中的詩學典範。師學古人，是臺灣文人作詩的一個要點，只是，哪些典範詩人值得學習？又如何學習？成爲觀察創作論的面向之一。根據筆者所閱讀的資料顯示，臺人屢屢提及的典範詩人有兩種：一是出於人格高尚而愛賞之；二是著重其人之詩歌創作。基於人格美而推崇的典範詩人，首推陶淵明，其次則是林逋。陶淵明與林逋最大的共通點，就是兩人都是隱士，顯然「隱士形象」對臺灣文人而言有其特殊性，箇中原因自然值得關注。至於著重詩歌創作之詩人典範者，有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孟郊、賈島、李賀、韓偓、蘇東坡等。李杜、白居易、韓愈、蘇東坡成爲效法對象並不意外，其中自有脈絡可循，但學習孟賈的苦吟精思，與李賀、韓偓的奇詭香豔，則形成一股詩學晚唐的風潮，甚至蔓延到 1895 年以後。以上的文學現象至今尙無人關注，而本書也將援引姚斯（Hans Robert Jauss）所提接受美學理論的觀點，對此進行深入討論。

四、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審美論

劉若愚藝術過程的第三階段，是作品觸及讀者的「審美理論」；而屬於第四階段的實用理論，則著重文學的道德、社會或政治效果。因實用理論主在強調文學的社會性、政治性，此雖非文學的審美效果，但臺灣古典詩自有寫實詩風的存在，如又將之細分可能過於瑣碎，且三、四階段所著重的關鍵均是「讀者」的反應，故本書將之置放於審美論當中的一節，亦即合併劉若愚的第三、四階段。

一直以來，關於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美學特質爲何，始終是較少人關注的問題，其中緣故在於過去學界研究臺灣古典詩時，較重視臺灣詩歌「以詩證史」的實用價值，對於美學風格這部分

多半略而不談。但從臺灣文人在詩歌、序跋評語中所表露出來的評賞態度，可知其詩歌美學觀的生成有幾種面向：

（一）受詩歌典律影響所形成的雅正美學。「雅正」是清代臺灣古典詩中一個很醒目的美學觀，如探討其原因與生成過程，可以發現它呼應了官方的詩歌品評標準。基本上，宦臺文人刊刻試牘、校士錄，乃至個人的制藝試帖作以獎賞生童，都是推動臺灣文教的一種表現，但這些具有典律性質的科考範本，被典律化閱讀後，也產生典律化的詮釋，大大限制臺灣士子的文學觀與審美觀，故臺灣從康、雍、乾、嘉到本土文人崛起的道咸時期，整體詩風傾向都不脫官方美學標準——「雅」與「正」，而對於雅正美學的欣賞，也在臺灣文人的詩歌、序跋中，成為衡量詩歌美感的一個準則。

（二）清真趣的詩歌美學觀。臺灣文人對自然之道的重視，與清代重學風尚所帶來的詩歌學問化，均是醞釀清真趣美學觀的背景因素，而這樣的審美傾向，又以鄭用錫、鄭用鑑、陳維英、林占梅等北部文人最為明顯。儘管這些詩人的詩作風格也存在不一致的現象，但出於對自然天真的愛好，以及博學厚積的詩歌本質認同，使得「清真趣」的詩歌美學自然產生，並集中體現在新竹的園林文學上。清代竹塹地區園林文學的出現，在臺灣文學史上別具意義，既說明臺灣文人開始擁有文學的主導權，也象徵臺灣文人自我意識的覺醒，這其中的脈絡觀察，牽涉到多種原因、多重面向，有很大的探討空間。

（三）以詩為史的書寫角度：寫實風格的產生。關懷社會現實、反映風土人文，是過去評論清代臺灣古典詩歌價值的一個重要依據，此刻，將之置於審美論中，追問的將不只是寫實詩歌呈現什麼？而是如何呈現？既是追問如何呈現，當然還旁及詩人本身的觀看角度與書寫手法。

(四) 從「不分唐宋」到「詩學晚唐」：清代臺灣文人對唐宋詩的審美態度。從臺灣文人對唐宋詩的閱讀、接受、理解與再創造出發，援引姚斯的接受美學理論，探討「不分唐宋」與「詩學晚唐」的文學現象，是如何生成又如何實踐。而兩種文學現象的形成過程與美學意義，將是探討的重點。

綜而言之，本書的基本構思，是由傅柯 (Michel Foucault) 「系譜學」(genealogy) 的理論啟發而來，但在實際的章節安排中，則以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所提出的批評理論為主要架構，從「臺灣文人如何認識詩歌？」的角度，來瞭解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生成經過，以建構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知識論。這個知識論所涵蓋的，是清代臺灣文人認識、創作、品評詩歌的各種面向，希望藉此研究路徑，能夠有助於更深刻體認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面貌。